

目 录

关于关泽恩烈士情况的信件五则·····	关煜坤提供	(1)
人民政协文史工作与统一战线的关系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黄 森	(1)
我们的父亲江刺横·····	江德珍 江民治 江哲筠	(7)
罗州考·····	钟绍益	(12)
廉江古城与连魁塔·····	揭驹业	(18)
《石城县志》考·····	揭驹业	(21)
廉江县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器·····	李瑞著	(23)
廉城的沦陷及光复·····	李支宪	(25)
日军践踏下的安铺·····	林 准整理	(29)
我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回忆·····	邹 琳	(33)
雷湾日军派专使驰抵廉江洽降		
·····	钟珠提供	(37)
廉江青年抗敌同志会会址·····	县地名志编辑室	(39)
廉江县宾兴简介·····	邓 杰	(41)
地名两则·····	县地名志编辑室	(44)
刘英智教授事迹简介·····	关锡琪	(46)
我县清末钦赐翰林蔡发祥·····	蔡一溪	(49)
“那”、“佻”、“壩”音义考·····	胡焕彪	(51)
粤桂边区游击赋·····	赖炳寿	(54)
诗二首·····	邓 杰	(57)
封面：鹤地水库大坝·····	唐植穉设计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 与统一战线的关系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黄 森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在一九五九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下开展起来的。至今已有二十六年的历史了。二十六年来（“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了十二年），在各级政协、历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领导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征集文史资料达四亿多字，编印出版史料一亿多字。这项工作，在它的自身发展中，已逐步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特点，不仅为史料的积累和研究开创了新的领域，而且丰富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形式和内容。

政协文史资料的特点，可以举出许多方面。比如它是历史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亲闻亲见，是对历史事件的追忆和追述，是当代人写当代事；它是综合性的资料，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科技、宗教、华侨、社会以至三教九流等各个方面；它也不局限于为史学界提供研究的原料，而且直接出版了可供广大读者阅读的史料知识读物，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活的教材。但是它最基本的，或者说最本质

的特点，是在于它运用统一战线的形式进行工作，而又以其工作的成果促进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一点在全国政协章程中作了明确的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因而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文史资料工作可以而且已经在促进爱国统一战线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首先是，通过史料的征集，可以广泛调动政协委员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的积极性，扩大统一战线的团结面。一九五九年，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茶话会上，语重心诚地希望六十岁以上的政协委员，除了“把自己的知识经验留下来，对社会有所贡献”外，还要求他们写些回忆录。他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许多老年人是经历了四个朝代的公民，应当从各个方面“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得到委员们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单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粗略统计（不包括地方政协），至今已有六万多人次提供了资料。

第二，文史资料的作者和读者，从历史的回顾和再现中，可以更深刻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结成各种形式的统一战线，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文史资料的撰写人，使自己在重温历史中，受到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自我教育；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则可以从文史资料具体生

动的事实中，受到在历史教科书中所不能得到的感染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于一九八三年创建的青年文史读物《纵横》深受青年的欢迎，印数达到三十万册，就是明证。

第三，通过文史资料的出版，使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特别是那些对民族解放事业、对社会进步作过贡献的人物的名字及其光荣事迹载入史册。这样，不但使该历史人物得到应有的历史评价和历史地位，而且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他们的亲朋和战友也是极大的鼓舞和慰藉。去年全国政协和全国侨联纪念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派人去香港组稿，受到陈先生的亲属、生前友好和学生盛情接待。有的人专程从新加坡到香港给我们写稿，有的人派专人送稿子回国，热心提供陈嘉庚先生的珍贵照片和手迹等，积极协助我们向海外发行回忆陈嘉庚的书和画册。我们发表了张伯苓（原南开大学校长）、梅贻琦（原清华大学校长）的史料，在其友好和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说“一篇传记温暖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我们编印了《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一书，使黄埔同学深受鼓舞，进一步认识到国共两党“合则两益，分则两损”的真理，表示要为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促进祖国统一，作出新的贡献。许多人从发表的文史资料中，得到一个结论：一个人只要为国家民族做了一点好事，共产党就不会忘记他们，人民就不会忘记他们。

第四，文史资料实事求是地揭露反面人物的历史，可以使之在人民当中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通过了解旧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分清历史是非，从而更加深入地启迪今人，

教育后代。

最后，我们还要提到，征集文史资料还可以对落实政策起到调查研究 and 促进的作用。例如，《武汉文史资料》发表了一篇《陈时与中华大学的几个片断》的文章，写的是在中华大学当了四十年校长、解放后被判十二年徒刑并早已去世的陈时。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现这篇资料与原判有很大出入，引起了重视，指令原判单位黄陂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经过调查研究，仅用八个月时间，就实事求是地作出了重新判决，宣布陈时无罪，撤销原判。

综上所述，正如邓颖超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的：从形式上看，文史资料工作是属于“静”的工作，它在那里埋头伏案，看稿子、思考、研究、编辑，然后印刷出版。但是从效果上看，这种“静”的工作，可以发展为“动”的工作，可以扩大统一战线的对象和统一战线的影响，发挥文史资料对人民、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作用。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是新时期文史资料工作进一步发挥统战作用的正确方针

尽管文史资料工作在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过去受“左”的思想影响，在实际中也出现过一些偏差和不足。譬如，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一种说法：文史资料工作也应当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使得征集面受到限制，一些撰稿人有所顾虑，未能秉笔直书，甚至在稿件中多有检讨、认罪之词。特别是在十年内乱中，“四人帮”把这种“左”的倾向，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污蔑文史资料是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为“牛鬼蛇神”树碑立传，

并以文史资料的内容作为肆意迫害民主人士的“铁证”。这不但否定和歪曲了文史资料的政治作用，而且严重破坏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毁损了党与民主人士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起来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指导思想进行了巨大的拨乱反正工作。一九八三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是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

纵观近百年来的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从康、梁戊戌维新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贯穿其中一条红线不就是千百年来形成和巩固起来的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吗？在漫长的岁月里，多少仁人志士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呕心沥血，奋斗终生！多少爱国的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实业家在艰难险阻的环境中，勤奋工作，为振兴中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爱国主义是我们实现祖国大团结、大统一的坚实思想基础。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体现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就是要扩展视野，进一步扩大史料的征集面。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积极征集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上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对国家民族作过重要贡献的知名人士的资料和各行各业中具有时代建树的人士的资料。”这些人，不管他们属于何种阶级、何种党派，只要他们反帝、反封建，主张民主进步，对国家民族有过贡献，我们都可以征集出版他们的史料；不管他们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

主义，只要在学术上、事业上有时代建树，我们就要肯定其功绩。

扩大征集面，一个重要的新课题，是如何开拓港、澳、台及海外的征集工作。海外侨胞散居世界许多国家，有上千万人，连同他们的后裔有数千万人之多。他们远离祖国，但他们的心同祖国息息相连。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无不饱含他们的血汗和赤子之心。解放前后，许多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和各界人士移居欧美、东南亚和大洋洲等地，他们当中许多人心怀故土，希望祖国早日统一。港澳地区的同胞更与祖国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些方面，蕴藏着丰富的近代史料，是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去开展这方面的征集工作。现在随着开放政策的实行，中英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订，海峡两岸人民交往的增多，为我们开展海外史料征集工作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积极开展海外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

近百年来，我国社会处于空前剧变时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各派政治势力的消长，各方面人物的沉浮，都呈现错综复杂的情况。文史资料工作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历史事件、人物做出合乎实际的记录和评价。我们坚信，我们光明磊落的治史态度，一定会得到广大爱国者和正义的史学工作者的拥护。

（原载1985年5月3日《人民政协报》）

我们的父亲江刺横

江德珍 江民治 江哲筠

我们的父亲江刺横，原名江稚衡，广东省廉江县人，生于一九〇〇年。他少年时代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父亲在探索的道路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南路各地积极从事党领导的革命活动，誓不与封建势力相妥协。他改名江刺横，就是击刺强横之意。他爱用讲故事，绘漫画，编戏剧，教唱歌等方式，针砭时弊，宣传革命。他的宣传中肯有力，易为大家所接受，深为群众所欢迎。他曾画过一幅《煮鱼荐圣》（用煮熟的一条鱼供奉孔夫子）的漫画，以谐音表达“主义战胜”的信念。顽固派视他为大逆不道，而劳苦大众对他十分敬重。

为了筹集革命经费，他不计较生活困难，毫不犹豫地说服家人，把祖传的二十多石租产全部卖光押尽。

在党的关怀下，他曾到广州受训，回来后担任过廉江县农民协会的领导工作，一九二六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廉江的农民运动搞得比较出色，为了把廉江的经验推广出去，一九二六年二月，上级党调派江刺横、李鸿飞等同志到北海市开展工作。江刺横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北海市

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在党内则是中共北海市党小组的领导人，与李鸿飞、简毅、苏其礼等同志领导着以北海为中心的钦廉地区的革命运动。

北海虽属弹丸之地，但地处南疆边陲，毗连越南，有十万大山可作屏障，海上交通方便。孙中山就三次在这一边陲地区举行过起义，所以上级党组织很重视这一地区的战略地位，许多工作都与全国十大城市并列。父亲也特别重视和越南人的来往，并与越南国际主义者建立了联系。

父亲在北海依靠工农群众，团结进步青年，发展了党组织，贯彻党的反帝反封建政策，使全市革命形势如火如荼。仅数月就建立了各基层工会，组成了北海市总工会，同时还成立了渔民协会、农会、妇女解放协会。为了提高群众的觉悟，加强战斗力，市里举办过各工农团体的夜校和三届工人讲习班，还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工人纠察队。广大劳苦大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人们觉悟的提高，对封建神权的束缚已不堪忍受，十一月初，在总工会的发动下，各界人士纷纷集结起来，直捣地母庙、龙王庙，把那些木雕泥塑的偶像彻底扫除。

土豪劣绅的头目、市政厅长（即市长）陈椿熙为了维护封建秩序，下令捉去了四名工人纠察队员。

陈椿熙一贯横征暴敛，人民怨声载道。党组织顺应民心，于十二月初发起了一次“倒陈运动”，全市罢工、罢市、罢课，一万多人的示威游行队伍，高呼“打倒陈椿熙”，“立即释放工人纠察队员”，“不革命毋宁死”等口号，汇集在陈椿熙躲藏的、设在审判厅内的十一师师部，要求十一师交出陈椿熙。该师副师长邓世增为镇压群众，派出军队作

战斗演习，并指使数十名士兵枪上刺刀，气势汹汹地冲向群众，不少人被打伤。

群众虽然被刺刀驱散，但“倒陈运动”更深入地持续下去。父亲亲自撰写了声讨陈椿熙十大罪状的檄文，以“快邮代电”的方式发向全省。激烈的斗争震动了整个钦廉地区。十多天后，终于迫使陈椿熙倒台，释放了被捕工人。

一九二七年一月，父亲代表国民党北海市党部出席广东省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二月，国民党反动派根据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改组北海市党部，排斥父亲，露出杀机。

腥风血雨袭来之前，环境已十分险恶。家人曾去信叫父亲转移一下，他在回信中说：“虽然交出了党部，但还领导着工会，我的岗位就在北海。”表现了与北海人民一起战斗到底的决心。

“四·一二”事变后，为了反抗蒋介石的屠杀政策，父亲和其他同志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拟定了武装暴动的计划。其要点是：（一）成立暴动队，以工人纠察队为基础，再挑选精干人员扩大队伍，健全组织，派定各有关领导人员。（二）捕捉邓世增。由专人负责，成立行动小组，定出方案，探索他的行动规律，出其不意地把他逮捕囚禁起来，限他交出武装。（三）策反驻军，配合工农暴动队，扩大武装力量。（四）尽量征集民间武器弹药，并赶制大刀六百把。（五）准备好起义用的旗帜标志、文告等。党的活动更加隐蔽，重要会议改在市郊白屋的松林举行。

邓世增与革命是誓不两立的，他暗派奸细打听我党的活动，并于四月廿三日深夜突然全市戒严，包围了市总工会和我党的机关所在地——“肖我”照相馆，逮捕了江刺横等十

一人。

父亲等被捕后，北海各界无比愤慨，酝酿着全面的罢工、罢市、罢课，要求释放我同志；同时策动军队协助劫狱，已得到了驻在茶亭的一个连的军队赞同。邓世增得此风声，先放出烟幕，说二千大洋可以赎出一个人，企图麻痹我营救同志，一方面加紧刑讯逼供，准备杀害。

死亡在逼近，但父亲仍坚定地领导狱中的斗争，同志们都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敌人审讯钟辉廉烈士时，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钟回答说：“我姓中，叫中国人！”又问：“你多少岁？”钟答：“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不能从钟辉廉烈士口中得到任何口供，便转向潘铁汉烈士，以死相威胁，潘铁汉烈士铿锵地回答说：“干革命是不怕死的。一颗种籽落在地上，它会生出更多种籽来！共产主义是人心所向，共产党员是杀不绝的！”敌人对我父亲更是软硬兼施。当时的审判厅长以堂兄的身份劝他自首，也遭他坚决拒绝；又劝他以后不要再搞革命了，他说要革命到底不回头；堂兄最后说要送他到越南去，他也不同意，抱定宁愿牺牲也不动摇的决心。

可是邓世增还不死心，为了追出线索，破坏革命，又使出另一花招，宴请被捕同志，说“谁自首都可以介绍去当官，或公费出国留学”。父亲大义凛然，当即揭穿敌人的阴谋伎俩，鼓励同志们“就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昂首阔步，从容就义，唤醒群众，奋起革命！”说完一脚踢翻酒席。敌人恼羞成怒，喝令两个士兵举起刺刀向江刺横的臀部刺去，鲜血随即染红了衣裳。

到了五月三日，邓世增便将我们七位同志杀害了。他害

怕革命群众暴动或劫刑场，行刑前先在西炮台刑场挖好掩埋烈士的坟穴，沿途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佯作严密警戒，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西炮台，却把烈士们杀害于师部前的海滩上。父亲临刑面不改容，途中慷慨演说，激励人们为真理战斗，指出敌人的末日即将到来。一个匪兵想制止他说话，被他一脚踢倒。就在此年青生命的最后一刻，父亲带领同志们高唱国际歌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父亲牺牲后，家乡群众在白色恐怖下也举行了沉痛的追悼会，悼词悲愤难抑：

群众兄弟，孰如弟健。岂特群众，邑中仅见。弟之
壮气，英英风起。千里脱羈，瞬息千里。怀抱利器，
未竟所抒。天胡不吊，飞祸骤罹。呜呼！寿夭数定，
弟竟长眠。黄土一抔，碧血千年。

在北海市，每年清明节，也有不少群众和一些基层工会为江刺横烈士扫墓。

在父亲的遗体上，人们看到遍体鳞伤和被刺的两个创口，内衣里还藏有血迹斑斑的遗书：有给党的绝笔书；有给同志们的公开信；有勉励妻子抚养儿女继承遗志的留言。

父亲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他没有辜负党的教育和信任。党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好儿女，今天，虽然时隔五十五年了，江刺横还是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受到人们的敬重和怀念。

（原载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南路风云》）



钟 绍 益

罗州，是粤西地区（也可以说是粤桂边区）古代的一个地方政区名。它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较长，所辖的地域也较广，是一个有名的政区。但是，罗州初为县，后升为州，各朝代有所不同，所辖的范围也各异，因而带来了它的复杂性。我根据文献资料和手头上的考古资料，进行初步考释如下。

（一）

罗州县政区，始建于公元五世纪初（《化州志》说是南朝宋文帝元嘉三年，即公元426年），属高凉郡。最早记载罗州的，是《宋书》。该书州郡志·高凉太守条，说高凉郡领七县，其中就有罗州县，并注明它是新立的（刘宋新置的）。此后，《南齐书》、《隋书》及地方志，都有罗州政区的记载。看来，它的始建时间，无可置疑。

两汉时，今阳江、恩平、阳春、电白、高州、化州、吴川、廉江等八个县及茂名市境地，均属高凉县（见《谈史方舆纪要》卷一百至一百四·广东二至五。但一些书说，今廉江县地属汉合浦县。按地理情况看，我认为今廉江县西部地方，可能属汉合浦县地）。三国吴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分合浦郡，在汉置高凉县境内，置高凉和高兴两

郡，又把高凉大县缩小，在今恩平、阳江县境内，置思平、安宁、西平、广化、海安等五个小县。然而，直至南北朝前，今化州、吴川、廉江这一带地方，仍属高凉县管辖，均未单独设立县级政区。其主要原因是：“尚有高凉宿贼。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界未绥，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遁逃之藪。”（见《三国志·张严程阚薛传》）。地方上少数民族的势力还很大，地方政权管不了。到了南朝刘宋，才开始在今化州县境置罗州县治。这个罗州县，辖有今化州、廉江、吴川县地。但是，广大的劳动者，是土著越人（或称夷人、俚人、僚人）。他们居住在山区或丘陵地区，凭借山险，全其部族，置其君长，以维系其落后的社会制度。史书上说的“夷、獠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寔，略无编户。”（《南齐书》卷十四志第六）。未与汉人融合的越人，不服从汉人的行政管理，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为了加强统治，南朝齐代，在罗州县境内，复置高兴郡政区（三国吴置的高兴郡政区，在今阳江县西部境内，晋代后期已并入高凉郡。事见《读史方輿纪要·广化废县》条），其下并置宋和、宁单、高兴、威成、夫罗、南安、归安、陈莲、高城、新建等十个县。这些县，都见载于《南齐书》中。但由于这些县的规模小，存在时间短，缺乏史料，无法考证。疑它们分布在今化州南部及吴川、廉江县境内。这些县，很可能是“痾糜属之，多以土豪蠲主领其事，各相跨擅，析置不一”的县，是统治者用以怀柔越人的政治手段，通过封官许愿的形式，建立起来的不稳定的政区。

梁代对地方政区进行改革。武帝大通中（公元527—529年），升罗州县为州，置罗州政区，调整郡级政区，分罗州

县置石龙县、石龙郡（《高州志·高州府表》），把带有监察性的州级政区，置于郡级之上，形成州、郡、县三级，以加强地方政区的控制。罗州辖高兴、石龙两郡，管罗州、石龙、宋和等县。其辖境有今廉江、化州、吴川县地，其北边并辖有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博白、陆川、北流等县的接壤地带。

陈代的罗州政区，因梁制不变。

隋代大统一，对地方政区又进行一次大改革，主要是减少政区层次，扩大政区范围。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大并郡、县，把梁、陈遗留下来的三级地方政区，改为二级。初废郡留州，实行州管县。废石龙郡为石龙县，以罗州辖石龙、吴川、罗州县三县。当时的罗州辖境，仍有今廉江、化州、吴川县地，和辖有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些接壤地方。可是，到太业初年（约在公元605年），又废罗州，置高凉郡，并罗州县入石龙县，并划石龙、吴川两县隶高凉郡。隋高凉郡的规模，又回复到两汉高凉县那么大了。

唐代实行地方政区两级制。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废高凉郡，以石龙、吴川县地，复置罗州，并以两县地分置南河、石城、招义、零绿、吴川、石龙、陵罗、龙化、罗辩、慈廉、罗肥等十一个县。武德六年（公元623年），罗州治从今化州境内徙至石城；另在今化州及其与广西接壤地带，置南石州。罗州只领有南河、石城、招义、零绿、吴川五县，其辖境相当今廉江、吴川两县及广西博白县东部的一些地方（南河县辖地）。天宝元年（公元724年），罗州更名为罗州招义郡，石城县更名廉江县，招义县更名干水县。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改罗州招义郡为罗州。大历八年（公元773年），以南河县隶顺州（武德四年置顺州，其

治所在今博白县境)。这时的罗州，实领有吴川、廉江、干水、零绿四县，直至唐代灭亡。

五代时，罗州属南汉国。南汉在今合浦县东北地带置常乐州，以罗州之零绿县隶于常乐。罗州领县只有廉江、吴川、干水三县地了。

宋代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废罗州政区和廉江县政区，把廉江县辖地划归吴川县，罗州政区，从此在历史上消失。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又废干水、零绿两县，其地全部并入吴川县，上隶辩州。

（二）

罗州（包括罗州县）治所，三易其地，比较复杂。但它是罗州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弄清它的所在，比较重要。对此，我曾作过数次考古调查，然未能全部解决问题。

最初刘宋建置的罗州县治所，按《读史方輿纪要·吴川县罗州废县》条“县西北百十里，刘宋元嘉初，镇南将军檀道济于陵、罗江口筑石城，后因置罗州县”的记载，遗址当在“陵、罗江口”。陵江和罗江皆在今化州县西北境。陵江发源于广西北流县的旺山（《读史方輿纪要》作挟来山）；罗江源有二：一出北流县的谢仙山（《读史方輿纪要》作娥石山），另一出陆川县的老虎尾，两源流至化州平定圩汇合，称罗江。陵、罗两江南流至合江圩汇合，仍称罗江。所以陵、罗江口，就是合江圩，罗州县治在陵、罗江口，无疑就是在合江圩。然经两次考古调查，合江圩属河旁第一台地，水位甚低，小雨即受浸，今圩址被沙土淹没很深，也未

发现南朝遗物。且从吴川县治(当时在今吴川县吴阳区)往北走一百一十里,也未达合江圩。因此,宋置的罗州县治所,似不可能在陵、罗江口的合江圩。我们又把“陵、罗江口”这个概念作广义理解,在合江圩与林尘圩之间的罗江北岸,江湖圩北边,寻找到一个古代遗址。遗物丰富,地面遗迹亦似属县址规模,但不见城墙遗迹,发现南朝的陶片很少,似也不是县治故址。《化州志》卷十二古迹说:“宋齐罗州废县,在州西北古城山,元嘉三年,镇南将军檀道济于此筑石城,因置罗州县。”这古城山,在化州中垌圩西南边,属罗江支流——长湾河流域地带,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尚好,具有设立县治的客观条件。这有待于进一步作考古调查后确定。

梁代的罗州政区治所,志书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在石龙郡石龙县。一九八零年,我们在化州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石龙县故址。城址位于化州县城东三华里的旧城岭,坐北向南,板筑夯土墙犹存。经实测,东西广380米,南北长300米,周长1260米,总面积114,000平方米,是中古时代湛江地区规模较大的城镇。它是石龙郡、石龙县的治所,也是罗州的治所,现已被划为化州县城河东新城区,大部分地表盖起了厂房,遗址受到严重破坏。(具体资料见一九八四年《岭南文史》二期,本人拙作《冯洗氏地望州郡沿革及其故址调查》一文)。

唐代的罗州政区治所,地方志书也有比较明确的记载,位于廉江县城北二十五华里的龙湖村东南侧。一九五八年,广东省考古队梁明彝等同志首次发现和证实了它。故城始建于唐初,原为石城县治,武德六年(公元623年),罗州从石龙迁治于此。故城址座落在九洲江的南岸,总面积60,000